

今日思想丛书

双重见证

Double Witness

张新颖 著

t o -
d a 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见证/张新颖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今日思想丛书)

ISBN 7-5343-6966-5

I. 双...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086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双重见证

作 者 张新颖

责任编辑 邓冀粤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0 插页 2

字 数 238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这是一册当代文学批评选集，所收文章，最早的写于 1987 年，最近的则是 2005 年所写。十八年的时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八岁。

这期间也做过一丁点儿台湾文学研究，1997 年以来又在现代文学上用力，因为都各有专书，这里就不再编选了。似乎满意自己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但在这十八年间，从未离开过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

这个集子选了二十七篇文章，其中未曾收入我以前书中的，有十一篇，大多是这三四年写的。

一册小书，文字不多，却把大三大四刚刚开始试着写的四篇文章都放了进来。问自己，为什么呢？也许是青春消逝之后的惶惑和危机感，使得旺盛的生命阶段愈发令人留恋吧；况且那是 80 年代后期，文学也正处在旺盛的阶段。

但我也并不愿意，这个选集只是对过往的当代文学的历史、过往的个人批评活动和青春岁月的一份见证，虽然取名《双重见证》主要是这个意思；我还希望，它能够见证现在的起点和新的开始，不论是文学的还是个人的。譬如关于文学的语言困境的探讨，就只能算是个开始，换句话说，它有可能朝向未来。

2005 年 6 月 22 日

目 录

第一辑 语言困境

现代困境中的语言经验	(3)
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	(14)
附录:关于《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的通信	
(李振声 张新颖)	(33)
黑暗中的声音	(38)

第二辑 新文学作家在新中国

论沈从文:从 1949 年起	(47)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63)
路翎晚年的“心脏”	(79)

第三辑 小说:80 年代

重返 80 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95)
马原观感传达方式的历史沟通	
——兼及传统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	(114)

显性的与隐性的

——韩少功重构世界的方式之一解 (124)

荒谬、困境及无效克服

——余华小说试评 (134)

恐惧和恐惧价值的消解

——残雪小说论 (140)

新空间：中国先锋小说家接受博尔赫斯启悟的意义 (146)

第四辑 小说：90年代和今天

平常心与非常心

——史铁生论 (161)

乱语讲史 俗眼看世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无意义世界 (171)

《马桥词典》随笔 (179)

读《碑》 (183)

十年前一个读者的反应

——为新版《九月寓言》拼合旧文 (189)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纪实和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207)

“我们”的叙事

——王安忆在90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217)

知道我是谁

——漫谈魏微的小说 (223)

小说精神的源头、生活世界、现代汉语创作传统

- 林建法编《2003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235)

第五辑 诗、歌、散文与当代文化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249)

张楚与一代人的精神画像 (266)

困难的写作

- 述论 90 年代的诗人散文 (272)

带着偏见、麻木和心动

-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2001 年中国最佳散文》序言 ... (286)

界外消息

-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2002 年散文》序言 (289)

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

- 《新世纪编年文选 · 2003 年散文》序言 (298)

辑外 批评的批评

审美批评的原创性：生存根基的畅现与心智的交流

- 关于张新颖的文学批评实践及其理想的通信 刘志荣 (305)

表达的焦虑

- 漫谈张新颖的文学批评 周立民 (322)

第一辑

语言困境

现代汉语(我愿意用这个词来代替通常用以指称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或“现代白话”)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带着丛结的问题在各种力量关系中锻造自身,而且,非如此,就不足以成就现代文学,也不足以表达现代中国主体的精神遭遇。

现代困境中的语言经验

一

主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国卷入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潮流，由此而发生的现代中国主体的建构过程，必然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多方纠缠、矛盾重重的思想和实践，常常有意无意间与此牵涉勾连。牵涉勾连之所以难以避开，也许就是因为，现代中国主体的建构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之一，无论是否有足够的意识和清醒的自觉，都直接或间接通到这一根本。

我当然没有能力对这个复杂问题做全面的描述和论说，这里我只是想从语言——现代文学语言——的角度，特别是现代困境中的语言经验，谈一些浅显的看法。

二

以前讲中国现代文学，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后来发现有更早的新文学白话小说，就含混地说是第一篇“成熟”的现代白话小说。什么叫“成熟”呢？很难确定一个普适的标准；更值得追问的是，《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吗？

为了确立和巩固中国新文学的合法性,新文学的开山人物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着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维度上,为新文学寻求传统中国文学史资源的支持,拓通前后承接和发展的关系。其功甚伟,这里不论;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复杂情境和它不得不置身其中的多种力量互相缠绕、彼此冲突的世界,被有意识地简单化和明晰化了。用单纯、明了、清晰的方式描述和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总给人以难免隔膜、不够真切的感觉,恐怕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狂人日记》的语言并非“明白如话”,除了“吃人”的题旨显豁,全篇作品难懂之处甚多;仔细思量起来,就是“吃人”二字,也包含了很费解的意思。它的语言不同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指的白话是显然的——不妨想象一下,用《水浒传》或者《老残游记》的语言来重写《狂人日记》,会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有人有能力用《红楼梦》的语言来重写,结果恐怕也不宜做十分乐观的预期。毋宁说,《狂人日记》的语言非常“欧化”——姑且这样用这个词吧,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地把不熟悉、不习惯、不亲切的表达方式一概称为“欧化”——可终究还是汉语。这是什么样的汉语呢?不是白话,表面上又很近似白话,不是文言(除了开篇有意识用文言写的小序),又保留了诸多文言的成分、用法和特殊的感受性;“欧化”,表明它正面对和经受着传统中国系统之外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系统的封闭性,这个时候再说“中国”,已经不容易界限分明地说清何为“中”、何为“外”了。但《狂人日记》的语言到底是非常“欧化”,还是颠倒过来说,非常“化欧”,仍然是一个问题。现代汉语(我愿意用这个词来代替通常用以指称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或“现代白话”)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带着丛结的问题在各种力量关系中锻造自身,而且,非如此,就不足以成就现代文学,也不足以表达现代中国主体的精神遭遇。《狂人日记》语言的奇突和生涩、锐利和深厚、力量和困难,一定程度上正可以对应于一个现代中国主体的精神情境。

关于语言与主体精神的关系，章太炎早就有“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①的明识。无“心思”则无主体，不与“心思”往返相通的语言则不是主体性的语言。章太炎一再阐发他“用国粹激动种性”的主张，是因为“国粹”保存了“心思”，是个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主体性建设的文化根源。

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中的核心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同时又坚持，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心思”）出发进行落实。其落实之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语言的锻造。

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很多年，在东京留学时期，周氏兄弟一面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听他张扬“用国粹激动种性”一类的主张，一面却尽心搜集和翻译域外小说。一般看来，这是两种性质相当矛盾的事。在当时的鲁迅那里，却正合乎其思想的逻辑。他以极端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在相当矛盾的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着摩擦力巨大的精神和文学试验，也是锻造语言主体性的实验。

这两个极端，一端是“自此始入华土”的“异域文术新宗”^②。1909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收入波兰的显克微支，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特来夫，英国的王尔德，美国的爱伦·坡等七个国家、十位作家的十六篇作品，其中鲁迅翻译了安特来夫的《漫》与《默》、迦尔洵的《四日》三篇小说。作家作品的选择，不仅如译者在序言中自称的那样“至审慎”，而且渗透于此种选择中的现代意味是相当浓烈的。但是这种浓烈的现代意味似乎出现得过早，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法弥漫开来，注定了《域外小说集》无声无息的孤独命运。这种过早出现的孤独用另一件事来比照可以看得更清楚：大约十年后，留美归国后的胡适调查外文书籍的出售情况，他在书店里看到的外文作品，都是与欧美的新思潮无缘的，“怪不得

^① 章太炎：《规新世纪》，原载《民报》，1908年第24号。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10卷，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说过，不要说 Tscheckhov 和 Andrejev 了……”^①1921 年《域外小说集》出新版本，鲁迅在前一年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一篇序，其中对十多年前的遭遇仍然耿耿于怀，他特别解释说，这些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品中的人物，恐怕几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像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②

与选译作品的现代精神内涵和选译者本身过早产生的现代意识这一端恰成强烈反照，另一端却是译文的古奥，古奥至文言文的极限处。鲁迅在新序里承认是“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当初的序言却自称“词致朴讷”。“朴”，即是回到过去的意思，《域外小说集》特意用古字古义，正可见章太炎的深刻影响。问题是，之所以选择这样做的内在实质是什么？《域外小说集》的诞生，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翻译奇观，一方面它一反清末的意译风尚，“宁拂戾时人”^③，也严格直译；另一方面这种直译所用的却是古奥的汉语。这就像是在相距最远的两端寻求亲近、贴合，企图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创造出可能性。它的结果不免是“生硬”的，但正是这刺眼的“生硬”，表露了两种语言及其内含的文化意义系统之间摩擦的艰难和剧烈。

仅仅把《域外小说集》的直译理解成照搬过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这样理解的直译，往往是以所译的语言及其文化意义为本位，如果用汉语来进行翻译，汉语只不过是传达所翻译的对象的工具。《域外小说集》的野心，却是想以异域的思想和文学来试验汉语的接受性，通过有意识地追求艰难、剧烈的摩擦，试验汉语再造、新生的能力。通常所理解的直接照搬式的直译，不把与个体自身内部发生深切关系作为必

^① 胡适：《归国杂感》，原载《新青年》，1918 年 1 月号。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 10 卷，163 页。

^③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 10 卷，157 页。

需的条件，而鲁迅是把不与个体自身内部发生深切关系的介绍西方近代观念的做法斥之为“伪”的。不与自身内部发生深切关系，不产生巨大的摩擦，又怎么能改造和建设自身呢？《域外小说集》序言里所说的“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深意正在于此。

《域外小说集》的译者在把个体从异域的文学和思想那里获得的感受诉诸汉语的时候，有意识地使用尽可能古的字词义，这与鲁迅“白心”的思想紧密相合。这个“白心”，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正相反的东西，是被这一传统污染之前的、执著于内部生命真实的心灵状态，《域外小说集》选择尽可能古的汉语，也就是想尽可能地越过这一文化传统，而求接近于这一传统之前的“白心”状态的语言。这显然也是一种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性的企图。对于鲁迅的思想逻辑而言，对应于个体内部的深处，他理想中所要求的语言也应该处于民族文化的内部的深处。

从外在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个翻译实验是失败了，但对鲁迅个人来说，甚至对正在孕育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来说，却不能忽略和轻看其不同一般的意义：用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这样的摩擦，作为译者自身的内部语言的文体感觉才得以形成吧。”^①就此而言，《狂人日记》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常有论者惊异新文学之初就出现这样“成熟”的作品，其实一个现代中国主体的“心思”和语言挣扎求生、摩擦锻炼的艰难历程隐约其后。

三

主体并非容易获取一个质的规定性，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个人使用的民族语言，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剧烈变动中创造性地生成着的

^①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学人》，第 10 辑，260 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现代文学语言，轻言何谓主体性、何谓非主体性，往往失之武断、片面和表面化。

胡风的理论语言和路翎的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小说语言，常常为人诟病：当其时，就有人指责为纠缠夹杂，不忍卒读，甚至有害青年文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自觉者检讨现代汉语的主体性，仍以为这样的行文读上去颇为不适，阅读伊始，就可能撞得鼻青脸肿。毛病出在哪里？其中一说，是“欧化”。“欧化”扭曲了现代汉语，使得现代汉语的论述和创作变得像是翻译文体，现代汉语的主体性也因此丧失。

如果此说成立，首先就必须此说的前提成立，也就是说，先就存在着不扭曲的现代汉语，它是与翻译文体泾渭分明的，它先在地就具有主体性。这样的现代汉语是什么样的？它怎样呈现于文学创作中？有人举《红楼梦》、金庸的武侠小说、汪曾祺的创作为汉语创作的范例。这诚然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各自文学语言的意义我们领悟得远远不够，但是，汉语的主体性就寓居于这样的样本之中吗？语言的主体性可以被已经出现的独特作品定型化？可以从中提取普适的标准？如果说这样的作品才符合民族的审美传统和语言习惯，那么，主体性可以化简或等同于审美传统和语言习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审美传统和语言习惯已经固化了？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审美与语言能够与他们的现实境遇和精神活动相分离，而抽取纯粹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胡风和路翎的语言之所以会让人觉得纠缠夹杂、撞得鼻青脸肿，更深刻的原因不是“欧化”，而是“现实化”（仿照“欧化”给出这样一个说法）。此时的中国现实，早已全面地经受着世界现代性潮流的击打和裹挟。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混乱复杂、残酷激烈的现实情境中，胡风个性鲜明地指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

过程。”^①在胡风的思想里,对象不是作为客体、作为物来进行观察、分析、定性,主体和对象之间的相互搏斗,也就意味着对象不是凝固的、完成了的客体形象,而有自己的活的独立意志;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究其实质是对话的交际关系,由于这样的对话,才会引发深刻的自我斗争。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胡风所强调的主体和对象的搏斗是要转化为主体内部的“自我斗争”的,表达的过程也一直是主体内部“斗争”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胡风本人的理论写作充满了持续的内在紧张性。这种持续的内在紧张性造成了表述上的鲜明个性,而为人不喜的冗长纠缠,其实正是内在搏斗的过程所透显的思想痕迹。

在创作中最能充分体现这种血肉搏斗并把搏斗充分内在化,从而有力地支持着胡风理论主张的,在抗战以来的文坛上,当然首推路翎的小说。从路翎的叙述中强烈凸现出来的“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②,诸如此类的征候,都可以看成是激烈的心灵纠葛的文字显现。在路翎的小说中,很难看到对外在事物的“客观”叙述,他的作品虽然涉及长久的历史和广阔的现实,但“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以及“生活的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自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③的特征,全都是经过充分的内在化——经过紧张的“自我斗争”——才叙述出来的。在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题记里,路翎坦言:“我特别觉得苦恼的是:当我走进了某一个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时候,由于对这某一个世界所怀的思想要求和热情的缘故,我就奋力地突击,而结果弄得好像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了: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但这些弱点,是可以作为一种痛苦的努力而拿出来的;它们底企图,仅仅是企图,是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我一直不愿放弃这种企图,所以,也由于事实上的困难,就沒

^①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187~18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② 路翎:《我与胡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1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③ 胡风:《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序〈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全集》,第3卷,99~100页。

有再改掉它们。”^①路翎没有改掉的,某种意义上正可以说是面对现代劫难而艰难挣扎的中国现实图景。定型化的阅读习惯和要求被这种“奋力地突击”的语言撞得鼻青脸肿,也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并不是“欧化”使胡风和路翎丧失了文体的自觉和语言的主体性,而是他们以与中国现实的紧张“肉搏”和“奋力地突击”,去艰难获取中国主体的诚实语言。

如果一定要用扭曲这样的词汇,那么这种语言的诚实正在于这种扭曲上,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经验的诚实使得未经虚饰和掩藏的扭曲发生了。这里不妨引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见解:“文字痛苦的自我弯曲使得历史在获得密码的同时反省自身……而历史则被自身的经验性所规定。”^②

四

语言的主体性,不只关涉语言的使用者,而且应该同时关涉用语言创造出来的世界。

胡风和路翎曾经谈到过小说的语言问题,在路翎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的回忆文章《我与胡风》里,生动地描述了当年的讨论。

胡风说路翎小说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人物对话也缺少一般的土语和群众语言,胡风还转述向林冰的意见,说路翎写的工人,衣服是工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胡风还说,“人物缺少或没有大众的语言,大众语言的优美性就被你摈弃了,而且大众语言是事实,你不尊重事实了。”

“我说我的意见是,不应该从外表与外表的多来量取典型,是要从内

^① 路翎:《题记》,《财主底儿女们》(上),1 版,1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② 雅克·德里达:《爱德蒙·雅毕斯与书的疑问》,《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105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容和其中的尖锐性来看。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理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我说，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当然，这种情况不很多，知识少当然是原因，但我，作为作者，是既承认他们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承认他们精神上的奋斗，反抗这种精神奴役创伤的，胡风便大笑了。喜欢大笑也是他的特征。我说，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我说，我还是浪漫派，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胡风又大笑了。我还说，在语言奴役创伤的问题里，还有另外的形态。负创虽然没有到麻木的程度，但因为上层的流氓、把头、地痞性的小官与恶霸地主，许多是用土语行帮语，不用知识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而工农不准说他们的土语，就被迫说成相反的了。劳动人民他们还由于反抗有时自发地说着知识的语言。胡风赞成我的见解，他说，这样辩论很好。”^①

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路翎还做过这样的辩解：“文句上的毛病，那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暧昧的反感：常常觉得它们不适合情绪。”^②

路翎小说里的人物，尽管职业、身份、阶层各异，讲的却差不多是同一种语言，也就是作者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相似，而他们所受的责难也非常相似，列·托尔斯泰甚至也为此而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时指出，“采撷语言的多种成色，为主公写出鲜明不同的‘语言个性’，这些原则唯有在塑造客体性的完成论定的人物形象时，才会获得重大的艺

^① 路翎：《我与胡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7页。

^② 路翎 1943年5月13日致胡风的信，《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8页。